

晚明文化与晚明文学研究论丛之一



《金瓶梅》与 晚明文化

——《金瓶梅》作为“笑”书的文化考察

尹恭弘 著

华 文 出 版 社

晚明文化与晚明文学研究论丛之一

《金瓶梅》与晚明文化

——《金瓶梅》作为“笑”书的文化考察

尹恭弘 著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瓶梅》与晚明文化:《金瓶梅》作为“笑”书的文化考察/
尹恭弘著. - 北京: 华文出版社, 1997.2

ISBN 7-5075-0578-2

I. 金… II. 尹… III. 金瓶梅-文学研究 IV. I2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23633 号

华文出版社出版

(邮编 100800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网址: <http://hwcs.com>

电子信箱: webmaster@hwcs.com

电话: (010) 83086663 (010) 66035914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朝阳区科普印刷厂印刷

850×1168 32 开本 7.5 印张 160 千字

1997 年 2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

印数: 10001-13000 册

定价: 15.00 元

目 录

- 引论：文化视角下的《金瓶梅》** (1)
- 一、作者鲜明的文化心态
 - 二、世相·世情·世态
 - 三、《金瓶梅》的文化命运
- 第一章 《金瓶梅》与晚明儒家文化的卑劣化** ... (41)
- 第二章 《金瓶梅》与晚明佛教文化的财、色化** (57)
- 第三章 《金瓶梅》与晚明道教文化的欺骗性、腐败性** (73)
- 第四章 《金瓶梅》与晚明性文化的畸形化发展** (89)
- 第五章 西门庆与晚明经济文化的封建性** (107)

第六章	从西门庆的政治靠山看晚明政治文化的堕落性	(123)
第七章	从潘金莲看晚明家庭文化的凶残性	(141)
第八章	从吴月娘看晚明伦理文化的病态性	(167)
第九章	从媒婆看晚明市井文化的市侩性	(181)
第十章	从应伯爵、吴典恩看晚明游民文化的势交利合性	(193)
第十一章	《金瓶梅》:作为“笑”书的文化风格	(207)
第十二章	《金瓶梅》章法结构的文化意蕴	(223)

引论：文化视角下的《金瓶梅》

最先从文化角度审视、解读《金瓶梅》的，应是鲁迅先生。他在《中国小说史略》里指出《金瓶梅》是世情书中最有名的一部。所谓“描摹世态，见其炎凉”的世情书，实体现了中国文学史上一种文化类型的转变。我们准备沿着鲁迅先生的思考路线继续前进，将《金瓶梅》摆放在晚明时期五光十色、丰富多彩的文化环境里进行多层次、多方位的考察和观照，发掘出这部溶世相、世情、世态为一体的奇书的精神底蕴和价值。

一、作者鲜明的文化心态

要从文化角度审视好、解读好《金瓶梅》，首要的问题自然是剖析、挖掘出作者的文化心态。这个问题确实有一定的难度，因为《金瓶梅》的作者的姓名仍是一个千古之谜。尽管《金瓶梅》作者的后选人已形成了一个二十多人的长长队伍，然而至今没有一个人有十分坚实的材料能使大家信服，得到普遍的认同和首肯。其实，我们完全可以越过这个障碍。《金瓶梅》作者虽然未留下真实的姓名，但留下一个很有意味的别号——兰陵笑笑生。如果我们将这个别号放在晚明文化这个

《金瓶梅》与晚明文化

大环境中认真考察，并结合《金瓶梅》这部小说的文体统一思考，就能明显地透视出作者的文化心态，而且能生动地勾勒它、描绘它。这一点似乎比探究作者真实的姓名更具理性的魅力。

别号“兰陵笑笑生”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就是“笑笑生”三个字，它具有浓厚的时代色彩。晚明文化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对笑理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和多方面的探索，从而对它有较深刻的体悟和认识。赵南星在《笑赞题词》里充分肯定了笑“可以谈名理，可以通世故”的理性作用和现实意义。冯梦龙则在《古今笑自叙》中进一步指出：“一笑而富贵假，而骄吝伎求之路绝；一笑而功名假，而贪妒毁誉之路绝；一笑而道德亦假，而标榜倡狂之路绝。”还在《题古今笑》里说：“眼孔小者，吾将笑之使大；心孔塞者，吾将笑之使达。”形象地说明了笑的作用的广泛性。当然，要使笑充分发挥作用，必须分辨笑的各种类型。郭子章《郭子六语》中的《谐语序》就提出谐语有二种：一种是“无益于理乱，无益于名教，而御人口给者”，一种是“批龙鳞于谈笑，息蜗争于顷刻，而悟主解纷者”，这自然有高、低之分，深刻、浮浅之别。作者显然是赞赏高级、深刻的谐语。这一点，王思任《屠田叔笑词序》就论述得更为完备。他在说明“笑亦多术”之后，特别推崇的是屠田叔阅历深厚而发生的“笑”，显出他赞赏是有丰富文化内涵的笑，实际上是一种富有智慧的诙谐和幽默：

海上憨先生(屠田叔)老矣，历尽寒暑，勘破玄黄，举人间世一切虾蟆、傀儡、马牛、魑魅抢攘忙迫之态，用醉眼一缝，尽行囊括。日据月诸，堆堆积积，不觉胸中五岳坟起，欲叹则气短，欲骂则恶声有限，欲哭则为其

文化视角下的《金瓶梅》

近妇人，于是破涕为笑。极笑之变，各赋一词，而以之囊天下之苦事，上穷碧落，下索黄泉，旁通八极，由佛圣至优旃，从唇吻至肠胃，三雅四俗，两真一假，回回演戏，绦龙打狗，张公吃酒，夹糟带清，顿令虾蟆肚瘪、傀儡线断、马牛筋解、魑魅影逃，而憨老胸次，亦复云去天空，但有欢喜种子，不知更有苦矣。

王思任这段论述的精神实质有三个方面：第一，屠田叔有深刻的人生体验，他能在“历尽寒暑，勘破玄黄”之后，能“用醉眼一缝”洞悉：“人间世一切虾蟆、傀儡、马牛、魑魅抢攘忙迫之态”的内在义蕴。这正是“笑”之所以具有深刻性的思想认识基础。第二，深刻的人生经验促使屠田叔产生创作欲望，也就是“不觉胸中五岳坟起”之后，他不是采用“叹”、“骂”、“哭”的方式来进行创作，而是“破涕为笑”，利用喜剧化方式来进行创作。第三，具有深刻人生体验的“笑”，不管是什么样的题材，但在经过“三雅四俗，两真一假，回回演戏，绦龙打狗，张公吃酒，夹糟带清”这样诙谐、幽默、嘲笑等方式处理后，同样具有“令虾蟆肚瘪、傀儡线断、马牛筋解、魑魅影逃”的强烈的艺术效果，决不可低估这些“破涕为笑”的喜剧化作品的价值。由此可见，晚明文人对笑理认识的深刻化程度。

同时，我们还应看到，晚明时期不仅对笑理有深刻的体悟和认识，而且表现笑理、笑术、笑姿的文学创作也极为丰富多彩。神魔小说《西游记》就充满着诙谐和幽默，有甚多的笑理，以致于胡适在《西游记考证》中说：“《西游记》所以能成为世界的一部绝大神话小说，正因为《西游记》里种种神话都带着一点诙谐意味，能使开口一笑，这一笑就把那神话人化

《金瓶梅》与晚明文化

了。”“这诙谐的里面含有一种尖刻的玩世主义，《西游记》的文学价值正在这里。”戏曲创作中的《齐东绝倒》、《一文钱》、《东郭记》、《邯郸记》、《博笑记》，都充满了喜剧化的处理，令人体验较为深刻的笑理。至于笑话集，那更是层出不穷，花样翻新，使人们领悟到一些颇具人生哲理的笑意。这种创作倾向也影响到正统的诗文——公安派三袁的诗歌创作，朱彝尊的《静志居诗话》就认为它是“诙谐”之体，而散文创作则有更多的充满笑理的诙谐、幽默之辞，以致成为晚明小品里一个显著的特征。由此看来，在如此重视笑理的晚明文化的氛围里，《金瓶梅》作者取别号为“笑笑生”，并非偶然，它具有同晚明时期许多文人一样的文化心态。这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它具有积极探索、深入洞悉社会世相的文化心态。《金瓶梅词话》前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安排，就是有两大段词作。前半段的四首词作似乎表现了作者的隐逸胸怀，后半段四首词作表现了社会世相中酒、色、财、气的危害。不少研究者对《金瓶梅词话》前半段的四首词作感到困惑，认为与全书的基调与意境不相调和、适应。其实，只要我们将这两段词作综合起来考虑，就会自然地闪出理性的光芒，原来这正是《金瓶梅》作者观察、洞悉社会世相的方式，也就是超然于世外又投身于世中的观察、洞悉社会世相的方式。只有理解了《金瓶梅》作者这种观察方式，才能领悟他为什么采用嘲笑、讥讽、幽默、讽刺的文体风格和叙事策略来展开全书的内容。如果将《金瓶梅》作者这种观察方式放在晚明文化的大环境中加以考察，就会有更亲切的理解和认识。

《金瓶梅词话》书前的前半段的四首词作的内容是这样：

文化视角下的《金瓶梅》

阆苑瀛洲，金谷陵楼。算不如茅舍清幽。野花绣地，莫也风流。也宜春，也宜夏，也宜秋。酒熟堪酌，客至须留。更无荣无辱无忧。退闲一步，着甚来由。但倦时眠，渴时饮，醉时讴。

短短横墙，矮矮疏窗。忆懂儿小小池塘。高低叠峰。绿水边傍。也有些风，有些月，有些凉。日用家常，竹几藤床。靠眼前水色山光。客来无酒，清话何妨。但细烹茶，热烘盏，浅浇汤。

水竹之居，吾爱吾庐。石磷磷床砌阶除。轩窗随意，小巧规模。却也清幽，也潇洒，也宽舒。懒散无拘，此等何如？倚阑杆临水观鱼。风花雪月，赢得工夫。好炷心香，说些话，读些书。

净扫尘埃，惜耳苍苔。任门前红叶铺阶。也堪图画，还也奇哉。有数株松，数竿竹，数枝梅。花木栽培，取次教开。明朝事天自安排，知他富贵几时来。且优游，且随分，且开怀。

据有的研究者考证，这里的前三首词是〔行香子〕，出自元代天目中峰禅师明本之手，清人张思岩《词林纪事》根据某笔记辑录了它们。但这三首〔行香子〕有的词作选本定为“无名氏”，看来这些词作的归属仍有进一步考察的必要。不管怎么说，这三首词的流传范围并不太广泛，而《金瓶梅》作者能注意到它们，可见他是文人，不大可能是走街穿巷的说唱艺人。这三首词，再加上他自作的一首，不过是表达他超然于世外的恬淡心境，实际上也是他观察世相的一种角度和姿态。这是晚明隐士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晚明隐士式文人如王稚登、张献翼、陈继儒，以至后来的张岱，他们当然有淡泊功名的

《金瓶梅》与晚明文化

恬静心境，但他们并不远离社会，相反，他们的人际交往相当广泛，他们的社会活动也很频繁，他们对社会也独有自己一套的想法和看法。这种状态也与《金瓶梅》作者有神似之处。^①事实上，他在词作的最后所抒发的“且优游，且随分，且开怀”的情绪，已透露出他并不远离社会的心态。由于一些学者对晚明这种文化现象认识不同，因而对这四首词发生疑问，如台湾学人魏子之在《金瓶梅原貌探索》里说：

从这四首词的慎独之情与出世之思的意境来说，它显然不是《金瓶梅词话》的前置词。《金瓶梅词话》的内容，写的是西门庆身家兴衰的故事，所涉及的是明末嘉（靖）万（历）年代那个淫糜的现实社会，早被公认是一部社会写实小说。……我们看《金瓶梅词话》描写的那个现实社会，不全是黑暗面吗！那里还能寻得出像这四首词意的慎独之情与出世之思的情节？可以说无处可见。

这种认识认为书前四首词有慎独之情与出世之思，书中就该有描写这种情思的情节。其实，晚明时期不仅一些隐士式文人有那种超然世外又身处世中的观察方式，就是一些入仕文人也有类似的心态。王思任在《夏叔夏先生文集序》里就强调一个“快士”式作家，必须有“尘粘自脱”的才能，实际上就是要有站在世事之外洞悉世事本质的生活体验。由此看来，《金瓶梅词话》的这四首词完全是书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并非游离的无用之辞。

^① 关于这问题，笔者有另一专著《名士风采——晚明隐士文化的新形态》详加论述。此书最后一章《金瓶梅作者身份的推测和描述》将分门别类地详细说明，这里不再详论。

文化视角下的《金瓶梅》

既然超然世外只是为了寻找一个更好地观察社会世相的方式和角度，那随之而来的自然是对社会世相的体验和总结，那下半段的《四贪词》就是最为形象的说明：

酒

酒损精神破丧家，语言无状闹喧哗。疏亲慢友多由你，背义忘恩尽是他。切须戒，饮流霞。若能依此实无差。失却万事皆因此，今后逢宾只待茶。

色

休爱绿鬓美朱颜，少贪红粉翠花钿。损身害命多娇态，倾国倾城色更鲜。莫恋此，养丹田。人能寡欲寿长年。从今罢却闲风月，纸帐梅花独自眠。

财

钱帛金珠笼内收，若非公道少贪求。亲朋道义因财失，父子怀情为利休。急缩手，且抽头。免使身心昼夜愁。儿孙自有儿孙福，真与儿孙作远忧。

气

莫使强梁逞技能，挥拳探袖弄精神。一时怒发无明穴，到后忧煎祸及身。莫太过，免灾迤。劝君凡事放宽情。合撒手时须撒手，得饶人处且饶人。

据海外学人郑培凯《酒色财气与〈金瓶梅词话〉的开头》的考证，以“酒色财气”劝戒世人是元明词曲、小说创作的普遍现象，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位喜欢抄袭他人词曲的作家，其《四贪词》却完全是自己的创作。以《四贪词》和其他酒色财气的词曲对照，就可以发现，《金瓶梅》作者更注意酒色财气的普泛化的危害效果，也就是它们对修身、齐家、治国的侵害：“疏亲慢友多由你，背义忘恩尽是他”，“损身害命多娇态，倾

《金瓶梅》与晚明文化

国倾城色更鲜”，“亲朋道义因财失，父子怀情为利休”，“一时怒发无明穴，到后忧煎祸及身”。这是对社会世相的洞悉。有的研究者把《四贪词》与万历十七年雒于仁上酒色财气《四箴》联系起来，认为《金瓶梅》有政治讽喻，这方面的内容固然不能排斥，但理解过于偏狭。尽管《金瓶梅》对社会进行了全方位的观照，可以说从皇帝到市井，但它的着重点无疑是市井社会。与其将《金瓶梅》看成政治讽喻小说，不如看成洞悉社会世相的文化小说。所以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深有体会地说：“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这种情况与前面所引的王思任《屠田叔笑词序》描述的屠田叔是一样的，他也能在“历尽寒暑，勘破玄黄”之后，洞悉“一切虾蟆、傀儡、马牛、魑魅抢攘忙迫之态”。这也是他们都能发出嘲笑、讥笑的思想基础。

二、他那极为自觉的以笑的方式(实际上就是采用嘲笑、讥讽、幽默、讽刺的文体风格和叙事策略)来表现社会世相的文化心态。前面已充分说明晚明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笑理进行了深入的发掘，并且分辨出笑这种方式的不同类型及其文化内涵，许多文人也力求发出高级的、深刻的笑理，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金瓶梅》作者自然会形成了相类似的文化性格。通篇《金瓶梅》对黑暗和罪恶并无声色俱厉的谴责和揭露，而更多的是对生活原生态极为生动的逼真的描述。正是在这描述中，却时时披露出作者嘲笑、讥讽、幽默、讽刺、感慨的文化心态。所以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早已深刻地指出：“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默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在说部，无以上之。”这真是具有丰富小说创作经验的会心

之论。

不少研究者对《金瓶梅词话》第一回开头的项羽、刘邦的故事进行过种种的推测，在我们看来，这些不过是全书的渲染和铺垫，其中固然阐述了情色的重要作用，但更重要的却是表明了《金瓶梅》的叙事风格，就是对无可奈何的事实进行无可奈何的嘲讽。曾是“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西楚霸王项羽，在四面楚歌、败走阴陵的情况下，担心的是容色出众的虞姬被酒色之君刘邦接纳，于是双双自杀。他所发出的“明月满营天似水，那堪回首别虞姬”的感慨，显然不是同情，而是嘲讽。贵为天子的刘邦，宠爱戚氏夫人，想立其子赵王如意为太子，无奈没有成功。一旦刘邦崩世，吕后也就酖杀了赵王如意，人彘了戚氏夫人。从作者发出的“戚姬葬处君知否？不及虞姬有暮田”的叹息声中，看到的仍是嘲讽的态度。作者在嘲讽了这二个故事后，也就自然引向自己创作的《金瓶梅》的故事，他要以更大的精力嘲讽《金瓶梅》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如今这一本书，乃虎中美女，后引出一个风情故事来。一个好色的妇女，因与了破落户相通，日日追欢，朝朝迷恋，后不免尸横刀下，命丧黄泉，永不得着绮穿罗，再不能施朱傅粉。静而思之，着甚来由。况这妇人，他死有甚事！贪他的断送了堂堂之六尺之躯，爱他的丢了泼天哄产业，惊了东平府，大闹了清河县。”由此可见，作者以笑的方式来展现社会世相完全是较为成熟的自觉意识。

别号“兰陵笑笑生”中的“兰陵”二字也不可忽视。过去研究者探索“兰陵”，一般将它看成地名，或指山东峄县，或指江苏武进，自从美国学者芮效卫在《儒家观点下的金瓶梅》里指出兰陵是有意影射公元前三世纪儒家大师荀子之后，

《金瓶梅》与晚明文化

使人们又开辟了一个新的学术视野。中国一位年青的《金瓶梅》研究者卜健在《金瓶梅作者李开先考》一书里又作了更为丰富的联想和发掘：“兰陵，由于荀卿曾在此地废居至死，带来了深层的意蕴。它不再单单是一个地名（或进一步说是一个不确指的地名），而时常兼有一种象征的意义。它既涵括着仕途的波折，志士的孤独，闲居的烦燥，世情的险恶，统治者的薄情寡义；也涵括着对造恶者的轻蔑和对一己之私的淡泊。兰陵成了一面历史的镜子，人们对着镜子站立，往事和时事便交汇成一幅纷纭的景象。”尽管我们不同意《金瓶梅》作者李开先说，但十分同情他对兰陵深层意蕴的联想和发掘。不过，在我们看来，如果结合《金瓶梅》全书的描述统一考虑，就会发现，兰陵的深层意蕴恐怕仍是人性问题，其他意义不过是围绕人性问题的展开和延伸。如果我们进一步将此问题放在晚明文化的大环境中考察，就会更加明朗。晚明可以说是和战国相类似的思想活跃时期，许多思想家、宗教家、文学家都对人性问题作过探索和思考。如思想家李贽一生都在反对假道学，因而他提倡人性中应该保存“童心”。又如宗教家、三一教教主林兆恩，他要会归儒、释、道三教，反朴归真，企图保持人性中赤子之心。再如文学家王思任则十分明确提倡告子的人性论：“《诗》三百，皆性也。而后之儒增塑一字，曰‘诗从道性情’，不知情即性之所出也。性之初，于食色原近。告子曰：‘食色，性也’，其理甚直。而子舆氏出而论之，遂令覆盆千载，此人世间一大冤狱也”（《落花诗序》）。在这样一个文化环境下，《金瓶梅》的作者自然也会注意思考人性问题，不过他更注意人性中丑恶的一面，这一点与荀子有相同之处。但他与荀子又有不同之处，他并不认为人性丑恶是与

生俱来的，他更倾向于人性丑恶是环境、交往中利益驱动的结果。这一点，《金瓶梅》作了生动的描述。由此可见，在表现社会世相时，力求提高到人性的高度来描述，这也是《金瓶梅》作者的文化心态。

通过以上层层分析，不难看出，尽管《金瓶梅》作者的姓名扑朔迷离，但其文化心态却极其鲜明，那就是积极探索社会世相的文化心态，较为自觉的以笑的方式表现社会世相的文化心态，表现社会世相时力求提高到人性高度的文化心态。当然，他那积极探索社会世相的文化心态是否做得十分准确，他那较为自觉的以笑的方式表现社会世相的文化心态是否做得十分得体，他那表现社会世相时力求提高到人性高度的文化心态是否做得十分恰当，这显然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以及他个人认识上的局限性，我们在全书展开论述时会恰如其分地加以剖析。不管怎么说，作者的这些文化心态正是我们研究《金瓶梅》文化义蕴的逻辑起点。

二、世相·世情·世态

《金瓶梅》显然是一个文人的独立创作。近年来，有一些研究者根据《金瓶梅》叙述文字里的不少错漏以及大量引用他人著作的事实来说明《金瓶梅》可能是世代累积型的集体创作，有一个说话艺人的流传过程。这种看法，恐怕不能成立。最直接的证据就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点滴的史料能支持这种说法。《金瓶梅》叙述文字里的不少错漏，似乎更可以说明是一个文人的创作，小说本不受文人的重视，但《金瓶梅》又以奇异的品味受到文人的青睐，迅速在文人圈中传抄开来，

《金瓶梅》与晚明文化

难免会出现错漏，这样的悖论很能说明中国小说悲、喜交融的命运。如果这部小说真有个说话艺人流传过程，恐怕错漏会减少不少。至于大量引用他人著作，只能说明《金瓶梅》作者对小说、戏曲、散曲创作的熟悉，并不能说明它是世代累积型的集体创作，因为所有引用他人著作的地方，《金瓶梅》作者都作过精巧的加工、组合和安排，完全纳入了《金瓶梅》完整的叙事系统之中。《金瓶梅》有统一的宏观构思，那就是要通过一些人物的命运沉浮来展现生动的社会世相，尤其注意表现世情（人际交往中的感情趋向）、世态（人际交往中的行为表现），因而充溢着晚明文化的氛围，加之他以笑的方式展现社会世相，因而引发人们更多的文化性思考与启迪。这正是《金瓶梅》的总体文化特征。

我们可以用两方面的例证来说明这问题。一是《金瓶梅》作者在利用他人原有的著作时，作了精心的、必要的改造和增饰，特别注意增加文化含量，以便更好地展现社会世相、世情、世态。二是《金瓶梅》作者善于从生活原生态中汲取灵感，转化为《金瓶梅》中的生动的故事情节，以便更清晰地显现当时社会世相、世情、世态中的文化意蕴。

先说第一方面。《金瓶梅》第一回至第六回、第九回至第十回，主要吸取《水浒传》第二十三回至和二十七回的故事情节，虽然改动不大，但很有意味的压缩、调整和增饰，却将《金瓶梅》的文化品味与《水浒传》明显地区别开来。《水浒传》对潘金莲的身世介绍极其简略：“那清河县里有一个大户人家，有个使女，小名唤做潘金莲，年方二十余岁，颇有些颜色。因为那个大户要缠他，这使女只是去告主人婆，意下不肯依从。那个大户以此恨记在心，却倒赔些房奩，不要武大